

中国发展报告

ZHONGGUO FAZHAN BAOGAO

财政与发展

贾康 白景明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发展报告
ZHONGGUO FAZHAN BAOGAO

财政与发展

贾康 白景明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财政与发展/贾康, 白景明著.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9

(中国发展报告)

ISBN 7-213-02070-6

I. 财... II. ①贾... ②白... III. 财政-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IV. F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3800 号

中国发展报告

财政与发展

贾康 白景明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责任编辑 杨林海

封面设计 王义钢

责任校对 张谷年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
(杭州环城北路 41 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37 万

插 页 2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2070-6/F·330

定 价 27.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章 中国的历史性双重转轨	3
第一节 中国为什么要同时推进工业化和体制转变	3
第二节 中国工业化推进的成绩和障碍	8
第三节 中国体制改革的运行轨道与攻坚态势	23
第四节 双重转轨对财政的挑战	28
第二章 中国双重转轨过程中的财政运行态势	32
第一节 财政政策和财政制度变迁的特征	32
第二节 我国财政支出膨胀过程和财政支出困难	43
第三节 政府收入来源结构	57
第三章 财政与经济增长	73
第一节 财政收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般过程	73
第二节 税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	77
第三节 财政支出与中国经济增长	83
第四章 财政与经济周期波动和总需求管理	99
第一节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实证分析说明	100
第二节 关于我国经济周期机理的探讨	108
第三节 财政运行与经济周期波动、整体运行的关系	114
第四节 如何发挥财政对实现经济运行的“反周期”稳定器作用	120
第五节 1998 年财政政策：实施“反周期”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案例	123
第五章 财政与体制改革	133
第一节 财政价格补贴与价格改革	133
第二节 税制改革与市场经济发育	146
第三节 财政体制改革与统一市场的建立	161
第六章 财政与区域差距和社会成员收入差距的调节	169
第一节 中国区域差距的实证考察	169
第二节 税收政策与区域差距	183
第三节 财政支出与区域差距	187

第四节	财政体制改革·对新转移支付制度的迫切呼唤和意义重大的起步·····	190
第五节	我国社会成员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与财政调节·····	203
第七章	财政与社会发展 ·····	211
第一节	中国公共事业政策与发展概况·····	211
第二节	财政与公共物品供给和可持续发展·····	219
第三节	财政与社会保障·····	222
第八章	中长期持续协调发展与重建财政、振兴财政 ·····	231
第一节	中国中长期持续协调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双重转轨中重建财政、 振兴财政·····	231
第二节	重建财政的基点之一：正确认识财政职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 要求与财政角色作用·····	236
第三节	重建财政的基点之二：理顺财政分配顺序，纠正政府与财政职能的 错位·····	239
第四节	重建财政的基点之三：转变某些政府职能的实现方式·····	242
第五节	重建财政的基点之四：把握“量出制入”与“量入为出”两个层次 上的平衡原理·····	247
第六节	在中长期持续协调发展中“提高两个比重，振兴财政” 的基本思路·····	249
后 记	·····	260

绪 言

发展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也是人类面对的永恒的挑战。星移斗转，沧桑无限，千古兴亡之中，透过血与火、泪与歌、野蛮与文明、喜剧与悲剧、渐变与突变、经济与政治……我们总能看到这样两个大字：发展。

对于 20 多年前结束“十年浩劫”而急切地进入跨世纪经济起飞的跑道、锁定“三步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发展更具有无与伦比的意义——对我们而言，这是个犹如“生存或死亡”的哈姆雷特式命题，或按毛泽东 50 年代的概括，是中国的“球籍”问题。

“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这句朴素的话语，包含了对国家前途和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透彻思索，以及在道路探求上的高瞻远瞩与真知灼见。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而启动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就是要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变革来解放生产力，从而解决好我们这个百多年来在落伍之列备受欺侮、饱经忧患、苦难深重的 5000 年文明古国，如何得以复兴和加快发展的问題，以及如何在发展中“共同富裕”和实现经济社会全面现代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问题。

放眼世界，汹涌澎湃的新技术革命浪潮正席卷全球，并且一浪高于一浪，时时在警醒着中国人：要调动我们的一切潜力，开拓创新，加快发展，努力赶超，以发展

为主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

然而，发展有其客观规律，只有正确认识和顺应规律，才能处理好发展问题。历史告诉我们，认识规律决非易事。几十年来，我们国家在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的同时，也曾有过太多的教训。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工作者，有责任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深入探求发展之道。我们写作本书的目的，就是在发展这一宏大主题下，从“公共经济”或政府理财——财政的角度，试对中国当代的发展与财政问题作一番从理论、政策到实际运作层面的梳理，勾画财政对于发展的密切关系及其在发展中应作的贡献，并探讨加快发展、持续发展和振兴财政，以及促进发展与财政良性循环的要点。

财政是为经济发展、为政府履行其应有职能服务的。既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切事情最根本的基准点是发展，既然政府最根本的战略性任务是组织全民族实现发展，既然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和赶超具有“生存或死亡”的重要性，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财政，必定是“发展财政”。只有自觉地顺应这种客观要求，正确地把握这一历史定位，并把这一定位融合于增长模式和体制模式“两个转变”的转轨进程，才能处理好中国的财政问题。

因此可以强调：所谓“发展财政”，就是为完成我国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以及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服务的财政；就是要把以往“生产建设财政”的弊端去除，而将其合理内容与市场经济中“公共财政”的精

华相结合并有所创新的财政。一言以蔽之，“发展财政”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我国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现代化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与配套的财政。

依照这样的角度、背景和思路，我们将在下面分八章展开讨论。

第一章 中国的历史性双重转轨

中国人民在反思过去、展望未来、通观世界的基础上,从1978年开始改变了以往的思维逻辑和行为规则,同时启动了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双重转变。这是一场革命,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整体思路的变迁抹去了中国经济的呆滞和苍白,充满生机的结构转变向原有的制度安排发起了无法回避的挑战。在此背景条件下,中国财政面对着工业化和市场化两相促进、两相共推的压力,自然而然地走向了新的天地。这对于财政运作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也为中国人民重新认识和运用财政政策提供了条件。

第一节 中国为什么要同时推进工业化和体制转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启动了双重转轨:一方面重构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体系,逐步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代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另一方面重组产业体系和流通体系,进而构造全新的生产和消费对接模式,把经济循环推入促进人民福利增长和消费进步的轨道,最终实现工业化。这是举世罕见的大胆尝试。事实表明,中国的尝试基本上是成功的。中国人民切身感受到了转轨带来的物质利益和精神财富。外界人士则对中国取得的成

就惊叹不已,很多国外著名经济专家在比较东欧和中国的转轨道路之后,对中国的转轨模式持充分肯定态度。他们在建立转轨经济学理论体系过程中,无不把中国模式当作正面经验来总结。

工业化和市场化是每个国家都要经历的历史阶段。工业化的实质内容是通过结构转换实现经济加速增长,从而最终优化生产方式,并大面积推广消费进步。这种结构转换包含了收入、贸易、生产和要素使用等多层结构变动,概括起来,是整体资源配置模式的大变动。各国结构转换没有统一模式,根源在于各国的资源禀赋、初始结构、国际环境、人力资本素质和发展水平等存有较大差别。人类社会最终要步入工业化社会,要通过第二产业的发展来反推第一、三产业的发展,为消费进步全面铺开创造基础条件。市场化并不是简单的制度变动,它首先是资源配置手段结构的变革,即资源配置格局的主要刺激力来源于市场。这种变化本身是生产力进步导致社会分工细密化和产权关系明晰化带来的必然结果,是确保社会化大生产和消费需求多样化相互动态衔接的有效方式。当然,市场化格局的最终落实需要一系列制度变革来提供条件和空间。同工业化推进一样,世界各国的市场化进程也没有统一的,或说是最优的模式,因为各国市场化推进的资源条件、政治条件、生产条件、人

口条件、产权布局条件以及国际市场环境 存有相当大的差别。

专栏 1 工业化的水平

通常用于区分工业化水平的指标有很多种。制造业（包括小型制造业生产活动）的附加价值的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是人们运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指标。然而，一般说来，制造业产出在总产出中的份额先是提高，然后下降。因为传统的服务业在发展的早期水平上较高，而随着工业化和整个经济发展的进程，其重要性会下降。于是，当达到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时，新的服务业（如广告业和旅游业）变得重要了。工业化水平的一个可供选择的衡量标准是，制造业的增值额在总商品生产增值额中所占的份额（总的商品生产是指农业、渔业、林业、矿产业、制造业、电力及其他公用事业、建筑业）。

当然，工业化水平分级的数据远非完美，并且官方汇率使国与国之间的比较出现扭曲。在那些拥有很大的农业部门的国家，甚至较大的制造业部门也被农业产出所淹没。如果制造业受到保护，其产出价值往往是以高于国际价格的水平计算出来的，这就夸大了制造业产出相对于大多数初级产品产出的价值，而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内，初级产品价格通常大致与国际价格水平相当，至于维持生计的农产品价格有时甚至低于国际水平。因此，一般来说，制造业增值对商品生产增值的比率提供了合适的分割标准，可把各国分别归入工业发展的四个层次或种类——已工业化、半工业化、正在工业化和尚未工业化。

对工业发展水平的估计仅仅表明发

展程度上的顺序，当然没有任何规范的含义。虽然在人均收入（从工业化水平和工业的主要产品构成这两种意义上说）的不同水平上出现了工业发展的某些大体形式，但这些形式主要反映了工业化战略和政策的相似性。它们并不表明存在一条工业发展的最优途径。确实，近 30 年来的经验说明，工业政策并不能对各个国家的需要和增长可能性作出充分的反应。在 20 世纪初，阿根廷和澳大利亚的经济很相像；资源条件相似，都有大量欧洲移民，人均收入均在世界最高国家之列，并且工业增长开始起步。中国的一些工业区像日本一样先进，甚至比日本还大。在决定各国的工业发展速度方面，政治、社会和经济政策的不同，比自然资源禀赋、国家规模和状况，或初始发展水平更为重要得多。

工业国

工业国主要是指那些制造业增值额占商品生产增值额 60% 以上的国家。这类国家主要由已有约 200 年工业发展历史的美国和一些欧洲高收入国家组成，但也包括一些相对的新进者，如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以及东欧国家。

然而，在某些具有成熟的工业结构的高收入国家（例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初级产业所占比重很大，制造业增值额在总商品生产增值额中不到 60%。在少数人均收入水平相对较低但制造业部门高度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制造业增值额则

在商品生产增值额中占了60%以上。中国台湾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城邦的”新加坡就是如此。在某些情况下，高度贸易保护和随之而来的制造业增值的高估，使工业化水平有些被夸大了。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因此被列入半工业化国家，虽然其制造业增值额几乎占商品生产增值额的60%。

工业国拥有众多优秀的企业家、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在市场经济国家，这些人通常在私人企业供职，而在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他们在公有制企业里工作。教育水平与其工业和技术水平同样高。外国公司和管理人员进入市场经济国家，并且外国技术得到自由的使用，只不过这种流动是双向的。一些重要例外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它们基本上是外国资本的接受国）以及日本（直到近年来，它实际上仍禁止外国管理者和资本的进入）。某些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已开始接受国际投资，特别是来自市场经济国家的一些技术密集型的投资。

对大多数工业国来说，工业化的尖锐摩擦和问题已成为过去。在市场经济国家，主要问题是不被衰退和通货膨胀所打断的充分就业和稳定增长，以及在生活质量不断改善条件下的私人消费和公共消费之间的平衡。那里的价格体系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决定因素，绝大部分市场价格与社会价格的差距不大，特别是对可交易商品来说更是如此。货币和信贷政策试图从总的社会轻重缓急考虑，税收制度也是这样。有组织的劳工和有组织的行业在收入谈判中，以及更为普遍地在整个经济中起着相互牵制的作用。它们在立法上进行了

种种努力，以减轻垄断造成的后果。

近年来，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仍然在制造业中相对密集地使用劳动，并且它们的技术严重倾向于相对大量地使用原材料，特别是能源。劳动和资本的生产率一般都比市场经济国家低一些。这些国家目前正在迅速提高它们的技术水平，并且以此来提高生产率。

工业国的大部分制造业一般都分布在利用地理上的规模经济而发展起来的一些重要中心城市地区。在某些工业国，城市发展布局不合理已使它们付出了沉重的社会代价。因此，在这些国家，制造业的分布以及城市的适当规模和结构是重要的政策问题。其他国家则实现了工业发展较为分散的形式，以使城市和乡镇的发展较为平衡。

半工业化国家

在半工业化国家（地区），制造业增值额一般占商品生产增值额的40%—60%。新加坡、中国台湾、香港特别行政区近年来才刚刚从这种类型“毕业”。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是拉丁美洲的半工业化国家，韩国则是东亚的这类代表。印度和中国也算在这类国家里，因为它们的工业部门既大又门类齐全，包括从基本金属、资本品和轻工业消费品的所有制造业发展阶段，尽管它们的农业部门仍然淹没了其制造业的产出。

一般来说，半工业化国家（地区）已经有了比较健全的国营或私营制造业部门。它们还显然已克服了人力和实物资本早期的严重短缺。这类国家（地区）的工业化是从一些技术复杂的部门开始的，这

些部门资本比较密集，但生产独立性强，缺乏规模经济效益。以色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在 50 年代中期率先冲破了这种形式，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在 60 年代已步其后尘。其他几个半工业化国家自那以来也走上了这条道路。但是，这种类型中的不同国家采用了导致它们的工业结构完全不同的有很大区别的货币、财政和劳动政策。东亚国家（包括工业国）的工业结构一般要比拉丁美洲国家的更为劳动密集得多。它们对其最丰富的生产资源——劳动力——的充分利用，使得它们更富于国际竞争力。近些年来，它们已经成

功地使工业与其他部门——特别是农业——平衡发展。

在半工业化国家，制造业在地理上的集中往往比工业国家更甚，其大多数制造业工厂集中在基础设施比较完备的极少数中心城市。虽然其他工业城区现已有所发展，一般来说，半工业化国家制造业集中在中心城市地区所引起的社会经济问题比工业国更大。半工业化国家在经济上（往往还有政治上）还不具备使城市地区可以得到迅速改善的基础设施和高收入水平。

在同一历史时期推进体制转换和工业化，实际上意味着中国要同时面对双重风险，承受双重转换成本。很显然，中国所作出的选择势必有其特定的压力和条件。如果没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前期教训，中国不会走上一条其他国家不敢走的道路。

工业化和市场化两者存有不可割舍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客观的，它本身是超越制度背景约束和经济发展条件约束的。人们在处理两者关系时，只能把它当做基本的约束条件来看待，而不能试图改变它。这种联系的理论体现和实际表现具体来说有如下几点：

（1）工业化客观要求市场化。工业化本身是一种结构转换和规模扩张。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意味着产出结构中工业品份额的不断加大。工业化的推进同时也会改变就业结构，把大批劳动力推入第二、三产业。总之，工业化就是资源配置格局的变化，是资源快速流入第二产业的转变时期。这种结构转换最终要把全社会经济规模推向新的水平，使全社会产品结

构更加复杂化，使全社会资源利用规模快速扩张。与之相伴随，经济区位结构也会发生重大变化，城市群体不断增加，城市经济地位快速提高。工业化推进所带来的这些变化要求供求两大系统改变连接方式，要求重构社会分工体系，也要求再造供求决策机理。在这种条件下，带有强烈个体分割色彩的自然经济当然不会把因生产方式转变而产生的批量剧增的产品顺利地输送到消费者手中，同时，超前于大众消费意识的新产品也不会被大批消费者所认同。总之，原有的植根于自给自足、小量剩余进入交换的生产与消费联系方式被自然打破，产出水平和产品结构的变动客观要求生产与交换两大系统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和更加长远的时间段内动态对接，这必然把经济推入市场化轨道。高度集权型的计划经济体制试图通过行政力量快速推进工业化，并把由此而产生的供给扩张与分散的需求连接起来。但几十年的实践表明，经济运行本身的灵活性和内在规律与行政安排是高度排斥的，行政性计划功能根本不可能取代市场配置

资源自有的优势,人类物质需求固有的选择性、分散性、多样性等特点与行政安排固有的强制性、集中性、单一性等特点根本不相容。正因为如此,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至多只是推动了重工业的发展,却未能全面推进工业化,而且大部分消费者并不能通过物质消费水平的快速增长而亲身感受到工业化推进的必要。很显然,工业化推进所导致的结构转换和规模扩张,要求有一个完整的市场去连接供求,要求供给系统通过对需求系统的震动和适应来逐步完善自己。换言之,没有完整的市场体系,没有货币供给规模的扩张和资金市场的运行,以及商品交易体系的构造,工业化推进根本不可能持续,工业化的成果也不会被大众所消化。

(2) 工业化推进需要新的制度环境。制度变迁具有特定压力和动力。经济制度变迁究其根源在于原有格局与经济运行的矛盾,其根本目的在于解放生产力和经济人的创造力。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生存了近30年。应当肯定,作为整治战争经济的一种方式,以行政命令为依托的计划经济起到了积极效果。但在中国已实现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之后,在中国已经建立了相对完整的行政管理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之后,经济制度的运行轨迹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就应发生实质性变化。事实也确实表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能使供求规模和供求结构真正平衡,计划上的平衡是以需求被强行框定为代价的,完全抑制了经济人主观意志的实现。因此,劳动者和企业均没有实际的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物质产品供给和精神产品供给失去了内在扩张冲动力。针对这种现实,中国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推入历史舞台,目的就在于通过市场选

择和分散决策来调动人们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进而通过人们对物质利益膨胀的追求来扩张经济规模并平衡供求关系。在此背景条件下,工业化的推进才真正具备了社会基础,因为工业化是改造人类物质生活水平的基本途径。在体制改革以前的岁月里,中国也曾推进过工业化,目前仍在发挥作用的一些老工业基地和基础设施就是改革前工业化运动的产物。应当肯定,当时的工业化运动是声势浩大、颇有成效的。但同时也应当看到,这些成效的取得是以资源的过度耗费和资源运用的过度倾斜及大幅度经济波动为代价的,当时工业化的推进是以牺牲农业和消费进步为基础的,而且重工业产成品制造被放在基础设施建设的前头来考虑,因而工业化步伐总是断断续续,迈不开。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性原因就是当时的制度环境实际上是限制经济流程正常运作,资源配置的利益分配基础尚未搭建起来,交易上的自愿性被强制性所取代。显然,中国只有变革制度安排,才能真正解决工业化推进所需要的内在刺激机制建立问题;也只有变革制度安排,中国的工业化推进才能是在整体结构依序变动的基础上进行。这些是工业化推进必备却又难得的条件。

(3) 市场化将为工业化推进拓展空间。经济市场化本身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所有能够进入交换、具有效用的产品和劳务都将进入交换领域,只要这种产品和劳务的消费行为不违背法律,不与社会伦理道德相冲突。二是经济货币化,也就是说,当市场化格局初步形成时,一切经济行为都将伴随着货币的流通,货币成为所有产品和劳务的表现形式,价格成为所有产品和劳务效用大小的表现形态。可见,当中

国逐步推进市场化时,也就是把大批原先不允许进入交换领域的产品和劳务推入市场,也就是使原先不伴随货币运动的经济行为也与货币流通挂起钩来。可见,市场化推进过程实际上也就是解放需求的过程,原先被行政手段和计划手段“锁定”的物质产品需求和精神产品需求要集中迸发出来,因而需求范围快速扩张,消费需求层次不断增加,消费需求弹性逐步加大。这样,消费难免反推供给逐步转换结构并扩大供给规模。因此,工业化推进也就有了实实在在的需求基础,工业化推进所要促成的产品结构转换和城市群体兴起也就有了定位依据。近十几年来,中国工业品市场、房地产市场以及服务市场的拓展根源,即在于伴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居民货币收入以及机构货币收入的膨胀形成了需求格局的多层次变动。

第二节 中国工业化推进的成绩和障碍

转轨时期,中国的工业化推进步伐不断加快。从增长结构角度看,近20年内的持续高速增长是以第二、三产业的超常高增长为主体支撑力的。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力就业结构发生了实质性转变;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础条件不断改善,公共福利水平相应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结构日趋复杂化。

从世界各国一般规律看,工业化推进时期是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加速发展时期。这点在我国得到了充分体现。转轨时期,我国第二产业增长率在大部分年份都超过整体经济增长率,工业增长成为整体经济发展的龙头。表1—1反映了1980—

1998年的情况。

由表1—1可见:在80年代,第二产业增长率与整体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差距波动幅度比较大,很多年份差距在3个百分点上下,有些年份甚至为负数,此间,工业增长率与第二产业增长率之间的差距也不大。进入90年代以后,第二产业增长率与整体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差距有所增加,其中大部分年份在5个百分点之上,1992年差距达到7个百分点,工业增长率与第二产业增长率基本持平;不仅如此,尽管前期房地产经济因过热而受到政府抑制,建筑业依然保持了高增长势头,其增长率仍旧高于整体经济增长率,1992年建筑业增长率高达21%,1996年达到8.6%。从整体过程看,第三产业的增长态势不如第二产业稳定。1981—1988年是第三产业增长比较快的时期,年平均增速在10%以上,1984、1985两年达到18%,是当期增速最快的产业。进入90年代,第三产业增速相对稳定,保持在8%左右,年平均低于第二产业4—8个百分点,此间,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业增速年平均在10%以上。转轨时期,第二产业的加速增长是以第一产业增幅的小步下滑为代价的。1982—1984年,我国第一产业增速年平均在8%以上,其后增速除1990年以外均在5%左右,1985—1989年,增速仅在3%左右,90年代增速稳定在4%—5%之间。第二产业与第一产业之间增长率的差距越来越大,1992年高达16个百分点。

显然,统计数据表明,我国的增长结构有其自身特点。与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推进时期的情况相比,我国工业化推进时期的快速增长并不过分倚重某一产业,呈现一定程度的均衡增长。表1—1数字显示,第一产业在工业化推进时期依

表 1—1 1980—1998 年中国经济增长结构 (%)
(上年=100)

年份	GDP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全部	工业	建筑业	
1980	7.8	-1.5	13.6	12.7	26.7	5.9
1981	5.2	7	1.9	1.7	3.2	10.4
1982	9.1	11.5	5.6	5.8	3.4	13
1983	10.9	8.3	10.4	9.7	17.1	15.2
1984	15.2	12.9	14.5	14.9	10.9	19.4
1985	13.5	1.8	18.6	18.2	22.2	18.3
1986	8.8	3.3	10.2	9.6	15.9	12.1
1987	11.6	4.7	13.7	13.2	17.9	14.4
1988	11.3	2.5	14.5	15.3	8.0	13.2
1989	4.1	3.1	3.8	5.1	-8.4	5.4
1990	3.8	7.3	3.2	3.4	1.2	2.3
1991	9.2	2.4	13.9	14.4	9.6	8.8
1992	14.2	4.7	21.2	21.2	21.0	12.4
1993	17.5	4.7	19.9	20.1	18.0	10.7
1994	12.6	4.0	18.4	18.9	13.7	9.6
1995	10.5	5.0	13.9	14.0	12.4	8.4
1996	9.7	5.1	12.3	12.7	8.6	8.0
1997	8.8	3.5	10.8	11.1	7.9	8.2
1998	7.8	3.5	9.2	8.9	12	7.6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摘要》1999 年。

然保持中速增长态势，第二、三产业之间的增长率差距拉得并不是很大。当然，这是与西方国家同期情况相比较而言。从总体上看，我国工业化推进时期的高增长是依赖二、三产业两个轮子，而不是第二产业一个轮子。这一观点，通过对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分析，可以得到更有力的佐证。

在我国转轨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结构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明显呈逐步下降态

势。1979—1984 年，该比重维持在 30%—33% 之间。1985—1992 年，该比重维持在 21%—28% 之间，大约 1 年下降 1 个百分点，1992 年最终降至 21.8%。1993—1996 年则稳定在 20%。如果以 5 年为一个阶段看的话，大约每 5 年下降 5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则明显呈上升趋势。1979—1992 年，该比重从 21% 升至 34%，其后又缓步下滑，1996 年降至 31.4%。从总体上看，第三产业比重提高的数值与第

一产业下降的数值基本相同。与此同时,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反而呈现出相对稳定态势。1978年,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已达到48%,其后到1994年该比重始终未过47%,1983—1992年这段时间,该比重甚至仅保持在42%左右(上下浮动1个百分点),只是到1995年,该比重才复升到48.9%。

转轨时期,我国第二产业所提供的GDP占全部GDP比重变化相当缓慢,而第三产业则呈现出了更为强烈的活跃性。不仅如此,就总体而言,转轨时期我国的GDP结构变动并不剧烈,三大产业相互的递推性相对较弱。如果绘成曲线可以看出,

越往后三条线的渐近度越大。这实际上说明,我国的结构转换有其特定背景,结构转换自身有其特殊规则,而且这种背景和规则更多的是以中国具体国情为基础的。

在工业化推进时期,增长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动势必联动就业结构。统计数据表明:转轨时期,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数的比重逐步下降,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逐步上升。尽管经过了近20年的工业化推进,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仍然远超第二、三产业各自的就业人数,直至1996年,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之和也未超过第一产业。请看表1—2。

表 1—2

第一、二、三产业从业人员人数

年份	从业人员合计 (万人)	构成 (万人)			构成 (%)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78	40152	28318	6945	4890	70.5	17.3	12.2
1980	42361	29122	7707	5532	68.7	18.2	13.1
1985	49873	31130	10384	8359	62.4	20.8	16.8
1986	51282	31254	11216	8811	60.9	21.9	17.2
1987	52783	31663	11726	9395	60.0	22.2	17.8
1988	54334	32249	12152	9936	59.4	22.4	18.3
1989	55329	33225	11976	10129	60.0	21.6	18.3
1990	63909	38428	13654	11828	60.1	21.4	18.5
1991	64799	38685	13867	12247	59.7	21.4	18.9
1992	65554	38349	14226	12979	58.5	21.7	19.8
1993	66373	37434	14868	14071	56.4	22.4	21.2
1994	67199	36489	15254	15456	54.3	22.7	23.0
1995	67947	35468	15628	16851	52.2	23.0	24.8
1996	68850	34769	16180	17901	50.5	23.5	26.0
1997	69600	34730	16495	18375	49.9	23.7	26.4
1998	69957	34838	16440	18679	49.8	23.5	26.7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摘要》1999年。

表 1—2 表明：从 1978 年到 1996 年，第一产业在就业结构中的地位下降了 20 个百分点，下降过程相对平稳；第二产业在就业结构中的地位上升了 6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则上升了 14 个百分点，两大产业在就业结构中地位的抬升同样比较平缓。可见，地位变动比较强烈的是第一和第三产业，第一产业下落的点数主要转移给了第三产业。从绝对数角度看，1978—1996 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增加了约 8000 万，此间，该产业就业人数很不稳定，忽高忽低；第二产业增加了约 9000 万；第三产业则增加了约 1.3 亿，呈直线上升态势。很显然，在工业化推进过程中，我国的就业结构变化独具特色。由于人口众多，我国在推进工业化时期面临着异常强大的就业压力。因此，即便是在工业化推进时期，第一产业仍然要吸纳大批劳动力。反过来，第二、三产业的就业吸容力则显示出较强局限性，当经济进入新的转换期时，第二产业就业吸容力的局限性就更为突出，结构转换在就业结构上表现得并不突出。这种情况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差别相当大。

从以上我们对增长结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分析来看，可以得出如下这样一个简短结论：中国工业化的推进有其自身特点。中国推进工业化时没有出现规模巨大、急剧加速的产业置换和效率流动。中国工业化推进更多的是体现在经济快速增长上，这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第三产业，该产业增长率之高远超过西方国家工业化推进时的第三产业增长率。此外，中国的工业化推进相对来说比较平缓，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劳动力和 GDP 增加值相对缓慢，事实上说明中国工业化推进需要第一产业的不断加固来支撑，同时，也从

侧面表明中国工业化推进时期第二、三产业的内部结构存在着诸多与第一产业关联度密切的行业。

很显然，中国推进工业化的背景条件有其特殊性。对此，我们只能采取务实、冷静的态度去寻求前人未走过的道路并做出适时有效的发展战略选择。

从总体上看，中国没有像二战之后的发展中国家那样选择出口依托型工业化推进策略，而是选择了主要依靠内需市场，开拓外需市场，积累部分外汇，以进口必需技术、产品、劳务来推进工业化的策略。这种策略选择与中国内需市场广阔、需求满足率低的实际状况是高度吻合的，也与国际市场进入成本偏高相吻合。

由于中国所选择的工业化推进模式适应中国国情的客观要求，近 20 年时间的工业化推进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经济并极大地促进了社会进步，因而也就相应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面貌和生存条件以及福利状况。这些成绩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国民财富总量规模快速扩张。

1978 年我国 GDP 为 3624 亿元，1997 年 GDP 总额则达到 74772 亿元，19 年时间恰好增长了 19 倍。1985 年每天创造的 GDP 是 24.6 亿元，1995 年达到 160.2 亿元，1997 年增长到 204.8 亿元。从 1978—1995 年中国人均 GDP 增长了 11.5 倍，1995 年人均 GDP 就已达到 4772 元，“六五”时期年平均人均 GDP 为 629 元，“八五”时期年平均人均 GDP 升至 3158 元。作为一个有 12 亿多人口的国家，人均 GDP 达到 500 多美元，应该说非常不容易。更何况中国工业化推进的时间不足 20 年，而且经济基础相当薄弱。

第二，工业化推进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国人民的消费状况。

1978年我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不足1300亿,1993年该项指标突破1万亿,1996年达到24614亿,18年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近18倍,平均每年1倍。居民消费绝对数增长和消费水平增长速度均呈加速态势,请看表1—3所反映的90年代情况。

从表1—3可见:90年代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增长势头依然强劲,其高峰期在1992年。1995年和1996年两年尽管处于经济软着陆时期,但居民消费水平增长速度仍在8%,与经济增长速度大体一致。从整体过程看,农业居民消费水平增长速度在1994年以后开始超过非农业居民消费

水平增长速度,后者1994年以后的数值远低于以前数值。这实际上说明我国低收入阶层消费扩张潜势相当强,整体消费扩张的持续化更多地要取决于低收入阶层消费实力的不断增强。另一方面,从绝对值角度看,我国居民人均消费规模实际上并不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因为全国人均消费数值已超过人均GDP的一半,非农业居民的人均消费数值则已超过人均GDP。如果我们比较1996年和1978年的情况,可以看到,在短短的18年时间里,全国居民年人均消费额增长了1至5倍,其中农业居民和非农业居民分别增长了11.4倍和13.6倍。

表1—3 居民消费水平绝对数和增长速度(1990—1996年)

年份	人均绝对数(元)			增长速度(%)		
	全国	农业居民	非农业居民	全国	农业居民	非农业居民
1990	803	571	1686	3.4	6.3	7.5
1991	896	621	1925	8.3	6.7	9.3
1992	1070	718	2356	12.9	9.8	15.4
1993	1331	855	3027	8.1	6.1	8.9
1994	1781	1138	3979	6.5	6.5	4.1
1995	2311	1479	5044	8.9	9.6	5.9
1996	2675	1718	5736	8.0	8.8	5.6

在消费水平快速提高的背景条件下,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逐步发生实质性转变。在我国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

费支出中,食品所占比重呈渐次下降态势。请看表1—4。

表1—4 食品支出占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支出的比重(%)

年 份	1985	1990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食品比重	52.2	54.2	52.8	50.1	49.8	49.9	48.5

应该承认,从表1—4可见,相比世界上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我国居民食品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依然偏高。但如果考虑通胀爬升因素和人口激增

因素,同样应该承认的是,中国消费结构能够在11年的时间里发生近4个百分点的转变要比其他国家困难得多,所带来的实际福利和受益方面要广大得多。食品消